

# 一份令人难忘的文件

——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下发三十周年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学 诚

1982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又称[1982]19号文件),开启了我国宗教事业发展的崭新阶段。30年来宗教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宗教工作的卓越成绩,充分证明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英明伟大。回顾历史,我们不能忘记正是[1982]19号文件从根本上纠正了党内外人士对于宗教的种种偏见和看法,恢复了宗教界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赢得了宗教界人士与广大信教群众的衷心拥护,堪称宗教界的“救星文件”。

[1982]19号文件系统阐述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思想,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宗教工作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了“左”的错误,契合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于宗教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1982]19号文件的深入贯彻落实,大量宗教活动场所得以恢复,大批爱国宗教人士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广大信教群众重新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1982]19号文件的中心内容,体现出我们党对于广大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的充分信任以及对于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政治、经济上根本利益一致的准确判断。文件强调:“在现阶段,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

的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如果片面强调这种差异,甚至把它提到首要地位,歧视和打击信教群众,而忽视和抹杀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忘掉了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体人民(包括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那就只能增加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隔阂,并且刺激和加剧宗教狂热,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恶果。”事实证明,1亿多信教群众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信任和厚爱,自觉主动地把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理想牢固结合,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有效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安定。

[1982]19号文件的基本精神全面贯彻于之后的宗教工作中。20世纪90年代,我国步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鉴于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如何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有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工作方针。1991年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重要观



点。1993年11月第十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对宗教工作提出三项要求(简称“三句话”):“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00年12月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明确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涵,“一是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二是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与民族的整体利益,宗教界人士要努力挖掘和发扬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多做贡献。”2001年12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三句话”补充为“四句话”。“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2002年10月,“四句话”被写入十六大报告。2004年1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贾庆林同志提出以“四句话”作为宗教工作基本方针。2007年10月,“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被写进十七大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完整概括。2005年3月颁布施行的《宗教事务条例》,则是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具体体现。随着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深入贯彻和《宗教事务条例》的认真落实,诸多影响宗教正常发展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党的宗教工作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世纪以来,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种种深层次矛盾凸显出来,社会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宗教信仰需求、宗教文化需求逐渐高涨的新情况,这就要求宗教界一方面要加以理性引导,一方面要创造更加丰富健康的宗教文化内容。在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发挥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积极作

用,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进一步深化,是科学发展观在宗教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新形势下宗教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1982]19号文件谈到宗教和宗教界人士的积极作用时曾指出,“宗教职业人员中的许多人,不但同信教群众在精神上有密切的联系,对群众的精神生活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而且还在履行宗教职务的形式下,进行着许多服务性劳动和社会公益方面的工作,例如维护寺观教堂和宗教文物,从事农业耕作和造林护林,以及进行宗教学术研究等等。”2001年12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做了系统阐释:“我们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鼓励宗教界多做善行善举。在国家引导和管理下,宗教组织可以从事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公益、慈善活动。我国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我国文化的发展相互交融,吸取了我国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哲学、医学当中的不少优秀成分,可以研究和发掘其中的精华。宗教道德中的弃恶扬善等内容,对鼓励广大信教群众追求良好的道德要求有积极作用。宗教通过对信教群众的心理慰藉,对稳定信教群众的情绪、调节信教群众的心理也有积极作用。”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鼓励我国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支持他们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祖国统一多作贡献。”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今年2月,国家宗教局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指出“鼓励和规范



洛阳白马寺举行印度殿落成暨佛光大法会

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是新形势下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是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有益补充”,并确立了“积极支持、平等对待、依法管理、完善机制”等四项工作原则。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认真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维护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他们在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

“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是中国佛教协会的立会宗旨,更是中国佛教千百年来一贯秉持的优良传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中国佛教协会艰苦奋斗,勇猛精进,与广大佛教信众一道开辟出一条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佛教复兴之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是佛教界发挥积极作用的根本保障。首先是健全组织机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协会根据形势发展与自身情况,分别于1980年、1987年、1993年、2002年、2010年胜利召开中国佛教协会第四、五、六、七、八次全国佛教代表会议,及时修订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选举产

生历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及本会领导机构,成立并增设理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会本部工作机构也日臻完善,各项工作得以有序开展,保障了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其次是完善制度规章。中国佛教协会陆续制定了关于传授三坛大戒、住持任职退职、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等一系列重要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第三,落实戒律清规。戒律是出家僧人的立身根本。中国佛教协会为指导汉传佛教传授三坛大戒的有序开展,在全国寺院提倡规范传戒、结夏安居、诵戒自恣等律制,举办规范传戒研讨班、执事进修班等培训活动,提高基层法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第四,培养教职人才。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居士在1992年提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30年来,佛教院校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人才素质不断提升。中国佛教协会精心举办讲经交流会、外语交流会等活动,加强人才交流,为人才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一批又一批中青年僧才成长起来,壮大了教职人员队伍。第五,教育居士信众。各地寺庙广泛开展夏令营、禅修营,加强弘法工作,增进居士信众的佛法正信。

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宗教关系列入五大社会关系之一,体现了党对宗教问题的高度重视。实现宗教和谐,建立和谐的政教关系,是抵御国际某些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根本保障。形成中国宗教的民族气象与鲜明个性,则是遏制各种形式宗教渗透的坚强堡垒,是贯彻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随着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国际宗教势力对于我国社会的不良影响已经开始削弱。





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以我国日益强盛的综合国力作为坚实后盾,中国佛教必将走向国门,将影响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和领域。

佛教界将积极响应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首先,佛教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和内在的协调性。“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太虚大师语)佛教重视人的尊严与价值,众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等理念,正是“以人为本”的充分体现。在广大佛教信众中加强宣导佛教基本伦理,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补充。其次,佛教研究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学科分支之一,对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大意义。佛教界除加强自身研究之外,还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举办各种学术论坛、会议,出版学术杂志和著作。第三,创造更多优秀的佛教文化产品,加快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和佛教文化产业。过去,经书、佛像、法物曾经是佛教文化主要的传播载体。如今,电视讲座、影视片、纪录片、动画片成为新的普及渠道。互联网的普及也为佛教文化的大众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第四,随着生活条件的全面改善,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佛教的禅修、禅茶、素食、健身等文化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欢迎,提高了人们健康生活水平,丰富了精神文化享受。第五,历史上佛教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成为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

公益慈善事业是佛教界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领域。今年《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的出台,是对宗教界历年开展公益慈善实践的充分肯定,为宗教界全心投入公益慈善事业指明了方向。30年来,佛教界在公益慈善事业方面成绩卓著。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在大灾大难面前,佛教徒发扬了慈悲济世的高尚情

怀,以实际行动支援受灾人民,树立了佛弟子的良好形象。佛教慈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在灾难救助、扶贫救助、老龄救助、教育救助、心理救助、医疗救助等方面创造出显著的社会效益,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使社会救助体系更加全面、更加贴近人心。

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是生态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佛教信众提倡放生野生动物,维护大自然生态平衡;推崇节俭惜福、减少浪费的低碳生活方式,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本着不杀生的理念,提倡不施农药化肥的有机耕作,保护耕地资源。

佛教界努力开展对外交往,为促进祖国统一、增进国际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古以来,佛教一直充当着和平的使者,把亚洲人民广泛地团结在一起。时至今日,宗教感情仍然是联系海内外同胞的精神纽带,也是建立国际友谊的捷径。世界佛教论坛、佛舍利海外巡礼、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等重大交流活动的举办,彰显出中国佛教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中国佛教协会还经常参与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联合国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等国际宗教活动,并保持与世界各国佛教组织的密切联系,传达了中国人民对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强烈呼声。

今天,我国宗教事业得以健康有序发展,宗教界合法权益日益得到法律政策保障,信教群众获得充分信仰自由,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党的英明领导,离不开[1982]19号文件确立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我们要倍加珍惜当前国家繁荣、宗教发展的大好局面,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使中国佛教事业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信教群众,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项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将对[1982]19号文件的最好纪念。